

中华魂百篇故事

刘伯承早期革命 的故事

记革命志士杨开慧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3



追求光明

如果我一旦死了，能在墓碑上题上：“中国布尔塞维克刘伯承之墓”十二个大字，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。

——刘伯承

刘伯承是我党、我军和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，特别是在军事上功勋卓著，成为开国十大元帅之一，在他 50 寿辰时，朱德曾写道：伯承同志对民族、对革命、对党和阶级具有无限忠诚。入党以前他激于爱国热忱参加了讨袁护法战争；入党以后，更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解放道路，乃毕其半生血汗，尽瘁于解放中华民族的革命事业，今天虽已弹痕遗体，须发斑白，但他永不知疲倦，刻苦奋发，任重道远。

一个晴天霹雳

刘伯承出生在四川省开县张家坝一户农民家庭里。1902年，刘伯承结束了他在本村五年的私塾生活，离家到灯草坝一户姓刘的私塾里继续攻读。

灯草坝附近有一座天灵寺，寺内有一个和刘伯承的父亲刘文炳相识的老和尚。刘伯承住在寺内，他的一切生活都由这个长老照管。

在灯草坝刘家私塾，刘伯承有两个启蒙老师，一个是任寿田，另一个是任贤书。任贤书是个流浪外地的落第秀才，对清朝政府有强烈的不满情绪，他曾给刘伯承灌输反对清朝政府的思想。另外，他们还给刘伯承讲了许多古人勤奋读书的故事：像西汉的匡衡凿壁偷光，晋朝的车胤囊萤取亮，南齐的江泌捧书追月，晋朝的孙康寒中映雪，以及汉朝的孙敬发髻悬梁，战国时的苏秦锥腿去瞌

等等。刘伯承很敬佩这些勤学苦读的古人，尤其是这些人虽然家贫却经过努力有了功名，使他很受启发。他下决心要向这些勤奋的古人学习。他放弃了很多休息时间，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学习。他读过的书，一般都能背下来，并作了许多圈点和批注，比如《孟子》，他曾阅数遍，批注满书皆是。他练习写字也是一丝不苟，每个字的每一笔画都要练上许多次，直到与字贴上差不多为止。由于他刻苦学习，成绩一直优异。任贤书老师曾对他的父亲说：“这个孩子学习刻苦，记忆力强，不仅能背诵正文，连注释也能背诵，将来肯定是个很有才能的人。”

1903年，刘伯承与父亲同去开县应考。这种考试是清朝政府为选拔官员经常进行的一种科举制度。在县预考初榜上父子二人均被提名，但因他们的上辈曾干过吹鼓手这种“下贱”的职业，便直接影响了受试资格，双双被逐出考场。刘文炳十分气愤，也深受刺激，他想通过科举制度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

幻想完全破灭了。

这种横暴的待遇，对刘伯承来说，简直是个晴天霹雳。他开始真正接触社会这个“大辞典”，他明白了，里边不仅仅有“正义、光明、美好和善良”，而且也还充满着“丑恶、黑暗、残暴和不公平”。这件事，使他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。许多年后，他谈起这件事时还是异常愤怒。愤怒之余，他充满了感谢之情，认为这是一件促使他醒悟的“珍宝”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许多记忆在他的头脑中模糊了，但唯独这件事始终埋藏在他的心中永不泯忘，成为他奋发向上的一种动力。

从此后，父亲决定让刘伯承接受新学，上高等小学。在入学考试中，他的国文考取第一名，立刻被录取。在这里，他整整学习了两年。

1905年，他进入夔府官立中学。但是只读了一年书，父亲便病逝了。这时，他才14岁。由于他是男孩中的老大，料理家庭的重担便落在他的肩上。沉重的农活和家务，使

他无法再继续坚持读书，他只得退学。

白天，他种田、割草、挑肥、砍柴、担煤、喂羊；晚上，他织席、舂米、料理家务。可一家几口，还要经常靠借债度日。

有几次，他想摆脱这种困境。他曾经于1909年同要好的朋友谢南臣、周澹澄到上海谋生，这时他年仅十七岁。但是，他的想法未能如愿，在上海他们转了许久，也没有找到工作，不久便又返回故里。

繁忙的家务和生活的艰苦，并没有使他放松学习。他每天总要挤出时间来读书。他最喜欢《西游记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》、《说岳全传》以及一些反映农民起义和斗争的书籍。对《红楼梦》、《封神演义》、《聊斋志异》、《杨家将传》等书籍，他也有兴趣。有些书籍，他甚至读上四五遍，还总爱把一些熟记的情节讲给别人听。对书中的英雄人物他也很钦佩，时常对伙伴们说：我们也应该像英雄们那样，忠于民众，报答国家。

刘伯承除了读书外，还经常温习上学时

学过的功课。他常用“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”和“温故而知新”的道理来鞭策自己，奋发学习，防止荒废了学业。学习中，他除了运用一般的学习方法外，还逐字逐条地背字典。刘伯承觉得这样做可以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，既可以学到全面而又广泛的知识，同时也可以锻炼自己的记忆力。他就是这样持之以恒，从不间断。字典中许多的条目都能够非常流利地背诵下来，使他成为一个知识丰富、文字基础知识十分扎实、记忆力极强的人。许许多多熟悉他的人都知道，一旦他兴趣来了，就兴致勃勃地拿出他背诵过的那种字典随便翻到哪一页，他就很快地会背诵出大部分的条目，既准确，又流利，有时还十分风趣，甚至把你能逗得捧腹大笑，有的地方甚至能连续背几页。一般人很难相信，但实际情况确是这样。

辛亥革命爆发 开始戎马生涯

1911年，是中国历史上激烈动荡的年代。清政府腐败卖国，假维新真保全；各地军阀封建割据，自拉势力；百姓备受盘剥，民怨沸腾。10月10日，辛亥革命爆发。不久，革命党人又在重庆起义。清政府统治基础完全动摇。

这时，早就对清政府不满的刘伯承，从四川境内不断发生的饥民暴动和抗捐等所谓“骚乱”中，预感到一种新的生活将会到来，加上几个弟弟、妹妹逐渐长大，可以担负劳动和家务了，便决定外出找一条有志青年应该走的道路。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决心去参加反对清朝的军队。他觉得只有军队，才是将来解放百姓、改变社会的关键。

母亲听说儿子要去当兵，心里很难过，对他说：

“家里这么多孩子，你是老大，一切都要靠你操持，你走了，家里可怎么过？”

刘伯承清楚，对母亲讲几句大道理，是说不通她的，便安慰母亲说：

“妈妈，您别哭，我在家里也一样活不下去，不如当兵还是一条出路。也许当兵还能挣到一些钱，可以养家糊口。再说弟弟妹妹们也都大了，也能帮您做事了。”

母亲见他态度比较坚决，而且说得也还在理，便答应了。

一些乡邻听说刘伯承要去当兵，都来相劝。乡邻们认为，不管怎么说，当兵的名声总不好，“好铁不打钉，好郎不当兵”，这是多年传下来的道理。还有一些好心人劝他经商，鼓励他走发财之道。

对于这些，刘伯承都婉言谢绝了。“鱼与熊掌不可得兼！”他说：“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火，岂顾一身之富贵！”不久，他便毅然剃掉了辫子，到万县参加了反对清政府的学生军。这年他 19 岁。几个月的学生军生活，没

有使他满足，他觉得应该求得更大进步。于是，1912年春天，投考重庆都督张烈武所办的重庆军政府陆军将弁学堂，以优异的成绩和威严的仪表被录取，开始了军人的科班生活。

当时，各省革命党人纷纷组织军队，准备讨伐袁世凯。四川老同盟会员熊克武在宜昌用川汉铁路款购置武器，组织了蜀军第五师，熊克武亲自任师长，但懋辛任参谋。自师长以下军官，几乎是清一色的同盟会员。第五师因官佐不足，熊克武向张烈武求援，经张烈武同意，选一些将弁学堂的优等生，成立速成班，限半年毕业，以补充部队官佐。由于刘伯承各门功课成绩优异，被选入速成班。

速成班的学制缩短了，但课程并没有减少。半年的时间里，要学“步兵操典”、“野外勤令”、“射击教范”、“兵器学”、“地形学”、“战术学”、“筑城学”等课程。除此外，还要学习国文和“算学”。当时，由于外国军事教材已传入中国，速成班又增加了其他国

家的一些军事课目。学习训练生活十分紧张，很少有属于学生安排的时间。尽管这样，刘伯承还是想法挤出时间，坚持读一些其他的书籍或者练一练毛笔字。

1912年底，刘伯承以各科全优秀的成绩，提前在将弁学堂毕业，而后被派到第五师见习，任司务长。

1913年7月12日，孙中山兴兵讨伐袁世凯，发动了“二次革命”。这时的刘伯承，已由司务长改任排长。他参加的第一仗不是讨袁战斗，而是在綦江打土匪。这是他指挥的第一次战斗，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用枪杆子实践自己的誓言。但是，他没有经验，不懂战术，不知道发挥一个排的作用。正象后来他自己回忆所说：

“当时，我是有勇无谋，只管一个人冲在前面，没组织好一排人，已经和敌人接上火了，后面的士兵还没跟上来。这一仗打得不好。”

虽然这仗没打好，但这是一次实际的锻

炼，它标志着刘伯承戎马生涯真正开始了。

在部队里，刘伯承很注意打听同事们的学历，不过他不是要与人比资格，而是为了向别人学习。当他一旦打听到与自己学历不同的人，就设法前往请教，向人家借阅教材。他说：我虽然没读过什么士官学校和讲武堂，但如果学会了这些学校的教材，并且能加以应用，也就等于上过这些学校了。

刘伯承是个正直的军人，他不抽不赌也不欺压士兵和老百姓，一有空就是看书。这在当时的军队中是很少见的。一些同事见他这样，觉得不可思议，就劝他出去散散心。他说：

“我觉得干那些事没意思，不如看书，能学点东西。”

有的同事说：“咱们当兵的，有今天没明天，读书有什么用？！”

刘伯承回答说：“读书有用，多读书，多掌握知识，多学点战术，就能多打胜仗。那我们就不但有今天，而且还会有明天，有后

天，有将来！”

他除了学习军事外，还注意学习历史，学习文学。二十四史里的许多文章，他都看过了；古代许多名著，他都愿意欣赏。《孙子兵法》既是中国古代军事著作的精华，又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杰作，他不知看了多少遍，据说能一字一句地全背下来，而且能熟练地运用。

刘伯承读书时非常专心，一般不理睬外界的干扰。以至有时朋友们来看他，如果不大声叫他，他都没有反应。当他觉察朋友在一旁等他时，就立刻放下书并向朋友道歉。这个习惯，在刘伯承的朋友当中传为佳话，许多年后还被人们常常提起。

8月，蜀军第五师在重庆举起讨袁军旗帜，通电宣布四川独立，推熊克武为讨袁军总司令。这就是第一次“讨袁之役”。在讨袁之役中，刘伯承在隆昌打了一仗。在隆昌战斗中，他接受了綦江战斗的教训，对士兵作了很好的动员和组织，集中全排兵力，攻敌

之薄弱环节，一举溃敌，取得了胜利。这虽然是一次很平常的战术指挥，但在当时雇佣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军队中，他的勇敢和主动精神，立即得到了上峰的赏识，使他受到表彰。不久，他被提升为连长。但是，不幸的是，在一次战斗中，他的左脚负伤。

“二次革命”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，但是，由于国民党是一个庞杂、涣散的政客集团，不能也不敢发动群众。而他们的军队又很不稳定，大都是为了某些个人和集团的私利而战，目的性很不明确，所以在北洋军的镇压面前，节节败退，各地讨袁军都在8月相继失败。9月，四川讨袁军也遭失败，熊克武逃亡国外。刘伯承带着自己的队伍左右厮杀，沿途左遇团练，右遇敌军，很快被打散了，他暂时躲进了一座和尚庙。

在和尚庙里，他意外地遇到了重庆将弁学堂的地形老师在此地测绘地图。承师生之谊，老师把他留在手下打杂。后来刘伯承又偷偷潜回重庆。由于不便公开活动，加之伤

未痊愈，不久，他就回到开县老家，躲进了山中。

讨袁之役失败后，四川有三百余革命党人被捕杀。袁世凯还开列了在逃的一百零八名四川革命党人名单，通令全国“严密查拿，勿使漏网”。因为在讨袁之役中刘伯承在隆昌、合川及泸州作战中勇敢杀敌，影响很大，四川都督胡文瀾四处捉拿他，但始终没能得逞。

刘伯承虽然隐居山中养伤，但他对时局的发展非常关心，不时传来的国难消息，使心中的怒火又燃烧起来。后来，当他得知第五师的一些将士到了上海，就再也呆不下去了，他约了几名原来将弁学堂的同学商量，打算去找这些同事。

寻求革命的道路

1914年的春天，刘伯承来到上海，与第一次他来谋取生存出路不同，这次他是为了

寻求革命的道路。

这时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少数资产阶级、小资产阶级革命派，继续进行反袁斗争。两次革命的失败对孙中山教育很大，他感到国民党目前这个组织，根本不能担负革命的任务，便于1914年6、7月间改组了国民党，更名为中华革命党，开始从事中华革命党的活动。在从事这些活动中，刘伯承接受了孙中山的许多思想。以后，他又陆续见到了但懋辛、李蔚如、张冲、吕超、余际唐、康云程、刘国佐等人。这些多数是川军第五师失败后逃出来的，大都是老同盟会员，具有强烈的反袁思想，是中华革命党的骨干。他们对刘伯承的思想影响很大。在与这些人士的不断接触中，刘伯承逐渐树立了忧国忧民和反帝、反封建的新思想。

1914年8月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。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强占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。接着，又在1919年1月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“二十一条”。消息传出，刘伯承和其

他进步人士一起，在上海积极组织和参加了反日活动。这一活动，对刘伯承来说，影响是深刻的。他开始感到人民群众的伟大。

1915年12月12日，袁世凯宣布推翻民国，恢复君主制度，自称“中华帝国皇帝”。

袁世凯一当皇帝，全国各地纷纷通电声讨，河南、陕西、山东、云南等地立即举兵声讨，湖南、上海等地工人举行了罢工。中华革命党在统一了川、云、贵、陕、甘、江、浙、闽、赣、鲁、晋、湘、鄂等地组织之后，坚决投入了反袁斗争的行列。

早在9月，四川老同盟会员熊克武从海外回到上海，会同中华革命党的卢师谛、但懋辛、李蔚如、余际唐、刘伯承等策划过讨袁起义。11月上旬，熊克武受人之约决定去云南参加讨袁。卢师谛、但懋辛受中华革命党之命，组织一部人潜回四川，准备策动军队和组织义军，响应云南方面的起义。经研究决定，王伯常、刘伯承以及原川军第5师的吕超、康云程、李越生等人在川东组织起义，